

佛门龙象

华夏的第一个和尚

—

对现代人来说，泛泛地谈佛教文化，多半是隔膜的。然而，不论在什么地方，如果远远地望见一座古塔寺庙，或者看见一个和尚、尼姑，人们便会立刻想到佛的灵光、佛的智慧。而这正是佛文化的内涵与象征。

还是孩提的时候，在村子里，偶然看到一个穿袈裟的和尚，大家就都很惊奇，也格外高兴，直围着和尚转圈。因为听大人讲，和尚是学佛修行的人，他讲经说法，是为了劝人为善，普度众生，所以孩子们都尊称和尚是“善人”。

因此，从儿时起，在我的心目中，和尚便成为善的凝聚、佛的显示。后来则想，若是没有中国和尚的话，恐怕也不会有中国佛教吧？是的，“弘法须人，度僧为最”（玄奘语）。

但有意思的是，在印度佛教传来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确乎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和尚。当时出现在中国的和尚，都是外来的“胡僧”，而且都不是直接来自佛教的摇篮印度，大多是从介于古印度与汉地之间的西域而来的“二传手”。如佛经汉译创始人的安世高，便是安息国（今伊朗一带）的太子，当轮到他继位时，他却让给他的叔父，自己则出家修道了。他修习禅定，游化西域各地，于东汉桓帝建和初年（147），辗转来到中国洛阳，译经布道，颇受欢迎，影响也很大。

当时有一个名叫严佛调的读书人，就从中受到启发，也引经解说并撰写了《沙弥十慧章句》。因此后来的不少佛史家们便认为严佛调是“汉地第一个出家者”。

其实，认真说来，严佛调还不是中国的第一个和尚。因为，据史籍记载：“汉初传其道，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，以奉其神，汉人皆不出家。”严佛调是临淮（今安徽泗县东南一带）人是汉族，他不可能冲破当时“汉人皆不出家”的时代限制。再说，他只是受了安世高的一些影响，而且他的译经活动是在安玄的帮助下才完成的。

安玄比安世高晚来洛阳约 40 年，他并不是僧人，而只是一个居士。他来洛阳的主要目的，也不是译经传道，而是经商。只因：“博诵群经，多所通习”又精通华语，所以常与沙门讲论佛法。

严佛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安玄来往的，由安玄口译梵文，严佛调记录整理，共同翻译佛经。所以，严佛调同后来的牟尼子一样，虽然撰写出较早的佛教著作，但严格地说，他们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和尚，顶多是居士而已。

华夏的第一个和尚，当是曹魏时代的朱士行，他才是“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”（中国佛教协会编《中国佛教》知识出版社 1982 年版）。

二

朱士行，颍川（今河南禹县）人，生卒年月不详，大约生活在 3 世纪时期。

这时，离安世高、支娄迦讖来华弘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光景了。但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，尤其是在中原汉地的输入，却显得相当缓慢、凝滞。佛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，显得非常模糊与朦胧。

在这一百多年中，除了汉明帝刘庄“感梦求法”所产生的一点灵感火花之外，就是王公大臣们出于好奇而与外来僧侣的一些接触和交谈。顶多像笮融（东汉末丹阳人，崇信佛教，那样搞一些“设像行道”的佛事活动，要不就是立祠祭祀，以求长寿。

就大多数人来说，完全是用看待道教的眼光来看待佛教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看法，大体上还停留在“灵异”和“遥感”的混沌水平上。佛祖也好，菩萨也好，如同道教宣扬的诸神一样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仍然是一个祈福禳灾的幽灵。

至于佛教从汉地向古印度的反馈，则更显得封闭和迟钝。可以说，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一百多年间，基本上处于沉寂无声的状态，直到以无为本的玄学家的出现与形成，情况才开始了明显的好转。

汉朝的立国思想是独尊儒术和天命鬼神，连老子也被当作神来看待。但到了汉末三国时代，这种思想就像遭到了强烈地震一样，很快分崩离析了。

魏齐王正始年间（240～249），何晏、王弼等继承老庄，立论曰：“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。”从此玄学便脱颖而出，而玄学正是接受大乘佛教的基础。

外来僧侣敏感到这一变化，于是很快摆脱依附于道术的被动局面，主动向玄学家们靠拢。至此，佛教在中国才找到了真正的知音，而玄学也乐于做它的伙伴。这样，佛教才逐渐走向汉地，走向中国化的道路。

朱士行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，步入当时的佛教文化圈的。

三

《朱士行传》中说他“志业清粹”且“少怀远悟，脱落尘俗，出

家以后，便以大法为己任”。看来，他是一个读书人。而当时的读书人，是没有不受玄学影响的。

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”，正是当时读书人的超然玄远之旨趣；“振衣千仞冈，濯足万里流”，也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豪情风采。

沙门僧侣为了迎合文人士大夫们的这种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，便推出了《般若经》，果然受到他们的欢迎。可以说，中国文人士大夫们正是通过这一步而开始把眼光投向佛门的。只不过，朱士行捷足先登，他干脆“脱离尘俗”，出家依法，成了中国第一代比丘，也可说是汉地的第一个中国和尚。

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无疑是勇敢的。敢于第一个当和尚的中国人，也应该说是勇敢的人。何况，朱士行还有另一个足以令后人大为敬佩而惊奇的举动，这就是他第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去西域取经，为后来法显、玄奘等人去西方取经开辟了通道。

中国和尚一旦脱颖而出，便显露出中国人不怕艰险和求认真的宗风道骨。

四

《朱士行传》说他“出家以后，便以大法为己任。常谓入道资慧，故专务经典”。朱士行在洛阳研读《道行经》，常感到前后不连贯，有些连语句都不通。后来，他宣讲《般若道行品经》，更感到经文隐晦，语意不通，前后矛盾。因此，他“每叹此经大乘之要，而译理不尽”，遂“誓志捐身，远迎大品”，发誓要到西域去把真经取回来。

西域——一般指玉门关以西、天山以南和昆仑山以北的西北广大地区，当时大约有 36 个大小国家，其中主要的有于阗（今

新疆和田)龟兹(今新疆库车一带)疏勒(今新疆喀什)高昌(今吐鲁番一带)

在汉武帝时,西域“内属”,但到王莽篡位之后,“与中国遂绝”。直到永平十六年(73),汉明帝命将帅北征匈奴,攻取伊吾卢地,设置宜禾都尉以屯田,才使西域之路复通。说是复通,其实阻力仍然很大,不时发生冲突。到魏晋时,情况并无多大好转。即使没有政治上的麻烦,只就地理环境来看,到西域的道路也是相当难走的。没有国家的支持,只靠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去西域取经,一般人恐怕想都不敢去想,更不用说付之行动了。

然而,朱士行却不仅这样想,而且竟然这样做了。甘露五年(260),他从长安西行出关,不久即步入茫茫戈壁沙漠。这是西行的第一大难关,也是第一次严峻考验。

法显西行时留有日记,所以人们知道他是以死人枯骨为路标而摸索前进的。朱士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,人们不得而知。但其艰难危险程度,决不会比后来的法显好到哪里去,甚至可能更加危险。

沙海茫茫,举目四望,东西难辨,热风尘沙,扑面而来。上无飞鸟,下无走兽。在这样的沙海中穿行,就是巨人也会变成侏儒,金刚力士也会变成弱小懦夫。

然而,朱士行终于走出了戈壁沙漠。接着他又越过重重雪山峻岭,跨过奔腾汹涌的江河,最后终于到达天山南麓的东西方来往中心之地——于阗。

于阗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西南端,由此越过葱岭,便可到达大月氏、安息和康居等国,这是当时佛教输入的主渠道,因此于阗即成为佛教东传的集结之地。

朱士行把目标选在于阗是正确的,但是,他疏忽了一个大问题,这就是当时于阗虽然已有大乘佛教的流布,但居于正统地位

的却是小乘佛教。他要在这里寻求大乘佛教，势必要碰到麻烦。果然，他来到于阗之后，一打听，当地人都不理他，而且不无歧视，大乘经典，很难寻觅。

五

西沉的虽然永远是同一个太阳，但时间却在悄悄地向前推进。朱士行感到特别难熬，也很痛苦。即使在那茫茫沙海、重重雪山的艰苦日子里，他都没有这样气馁过。因为那时有个坚强的信念在支撑着他——取到真经，在中国弘扬佛教，造福万民。他说：“无信者不幸也。”这个精神支柱，一旦垮掉，他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。

西行取经，不仅难在“行”，而且也难在“觅”。而于阗人非但不奉行大乘，还反对大乘，戏称为“婆罗门书”。

大乘与小乘，本来同是佛门宗派，为何相视如仇呢？原来大乘与小乘，是有严格区别的。

简单地说，小乘重在个人解脱，讲究苦修苦行，远离城市，遁隐山林，提倡出世，主张禁欲，倡导四禅八定，以求得罗汉果位为目的。主要经典是《阿含经》。

大乘重人生，不离开社会，既注重个人开悟，又强调普度众生，即立佛国为净土，主张共同转化，在家也可，出家也行，重在修持悟道，领会人生的真谛，主要经典是《般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和《金刚经》。

因此，朱士行在于阗四处碰壁，常遭当地人的讥笑。一日，他好不容易才发现一部《般若经》，但持此经者根本不给他翻阅，而且一晃就不见了。

后来，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借到一部“正品梵书”，共 90

章，六十多万字。他只好动手抄录。好在不久他收了一个徒弟，名叫弗如檀，是当地人。有徒弟协助，他也就轻松多了。但抄录工作进行得很慢，因为是梵文胡本，又怕抄错，必须一一校正。经过长达 22 年的艰苦努力，直到晋太康三年（282）才抄录整理完毕。但正当他准备派弟子弗如檀将经书送回洛阳时，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，几乎使他前功尽弃。

六

朱士行在于阗取大乘真经之事，早已为当地人知晓。人们除了轻视他之外，对于这位中国来的和尚倒也没有过多的为难。朱士行入乡随俗，也不冒犯他们，而且相当客气，表现出中国和和尚的谦卑和与人为善的风度。

但是，想不到正待要将经书送回中原的时候，当地小乘学众却向于阗国王报告，说汉地沙门准备将“婆罗门书”传回内地去，这样势必迷惑正典。国王作为一国之君，如不禁止，将会断送大法，惑乱汉地，更是大王的罪过。于阗国王当即向朱士行宣布，不准送回经书！

几十年的努力，将会毁于一旦，朱士行真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一时不知如何才好。

最后，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虽然十分冒险，但眼前也只能如此了。经过一番准备之后，他便去谒见于阗国王，当面约法三章以“烧经为证”。如火不焚经，应准予送经；如火焚经文，即一火而焚之，就此了结此事（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三）。

朱士行说，这叫向天问卦，让佛祖来了断。

于阗国王见他说得如此神秘，也觉得是一个好办法。所以点头说，就这么办吧。

不知朱士行做了什么手脚，抑或真是佛祖显灵，总之是火燃起来了，那经文抄本居然见火不着。

于闐国王一看傻眼了。

朱士行说这叫“真经不怕烈火炼”！

无奈于闐国王只好放行，还夸中国和和尚很了不起，心能通神。最后再三请他留下来传授道法。

“积薪殿庭”当众“烧经为证”这件事本身就带有神秘色彩，不仅慑服了国王大臣，也使于闐民众感到震惊，于是对大乘法教，不能不另眼相看。

朱士行便决定留下来弘扬大乘佛教。大乘佛教在于闐已经暗中流行多年了，从此得以广为传播。

100多年后，当法显去印度取经，途经于闐时，他看到的情况是，当地“尽旨奉法，以法乐相娱。众僧乃数万人，多大乘学”（《法显传》），再后来当玄奘法师途经此地时，他看到的更是“崇尚佛法。伽蓝百余所，僧徒五千余人，并多习学大乘法教”（《西域记》）。

一直到公元1025年以后，喀喇汗王消灭了于闐王国时，才迫使当地人民改信伊斯兰教。

朱士行以八十多岁的高龄，圆寂于于闐。他虽然再也没有回到他一直怀念的家乡，但他所取的真经送回洛阳后，西晋时由竺叔兰译为《放光般若经》，从此广为传播，大放光明。后来道安还特别注意宣讲此经，并予以注疏。

更重要的是，朱士行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和尚与第一个西行取经的人，这种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，为后来的佛门弟子开了一代先河，也为后来的僧侣开创了一个佛国天地。

据说，朱士行圆寂后，当地人便按照西域荼毗（火化）的方法，火焚其遗体。但柴薪燃尽之后，火也熄灭了，朱士行的遗体

却完好无损。人们无不为之惊讶，都觉得是奇迹。后来，一位高僧合十咒曰：“你若真是得道的话，那身体也应当灭迹，不必如此作惊世之举。”此时朱士行的遗体才应声而化。

后来，此事传到中原，就成为“金刚不坏之身”的典故。汉地僧人死了，都实行火化的制度，大抵也是从此开始的。而朱士行说的“无信者不幸”（即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可能幸福的）这句偈语，既成为后世僧侣的信条，也成为信众的人生格言。

华夏第一个和尚的精神和影响，是不可泯灭的。杭州飞来峰龙泓洞中，至今还保存有出自宋人之手的朱士行浮雕造像，题记称他为“朱八戒”。

中国的第一个尼姑

前文介绍了中国的第一个和尚，那么，中国第一个尼姑又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？这也是中国佛文化中的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。不过，尼姑的出现比起和尚来，难度似乎要大得多。

即使在印度，也是先有和尚尔后才有尼姑的。

当释迦牟尼得道成佛后，便有许多人来皈依他，要求成为佛门弟子。据说，释迦首先接收的是两个商人，接着是迦叶三兄弟。他到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之后，又收了舍利弗、目犍连等十大弟子。后来释迦回到故乡，他的异母弟难陀、堂弟阿难及释迦的儿子罗睺罗，也都随他出家了，连宫廷中一个剃发工匠优波离也出家加入了他的僧团，后来成了有名的戒律大师。

这时，从小将他抚养成人的姨母波闍波提也想皈依佛门。但释迦牟尼从未收过女弟子，况且又是他的姨母，便因此拿不定主意。想不到他刚收的最年轻也是最漂亮的弟子阿难，倒替老师解开了这个“千千结”。他说，入道不分先后，学佛不分男女，佛法不分高下，众生一律平等，皆应一视同仁。一向倡导“世法平等”的释迦牟尼自然接受了阿难的建议，连声说“如是如是”。这样，佛门中便有了第一个女弟子。接着又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徒弟。

在佛祖的出家弟子中，男的叫“比丘”，又叫“邬波驮耶”，意

译为“亲教师”即师傅的意思。女的则叫做“比丘尼”又叫“苾刍尼”即出家后受过具足戒的女僧，简称为“尼”。在家的弟子，男的叫“邬波索迦”，女的叫“邬波斯迦”。在家信教的，男众叫“优婆塞”，女众叫“优婆夷”。

在家和出家的佛门弟子都可说是“三宝”（指佛、法、僧）之一。佛法的传播，大抵就是由他们来完成的。

当佛法传到中国之后，直到曹魏时，仍是“汉人皆不出家”。后来，这条防线终于被朱士行突破了，不过也仅限于男士，女的要出家为尼，那还是不行的。中国佛教有僧无尼，显然少了“半边天”。这对中国佛教文化自身的发展极为不利。因此，中国佛教一直在期待和呼唤“比丘尼”的早日出现。

晋穆帝升平元年（357）中国人自己的比丘尼终于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了。她，就是出身于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，出家后法名叫净检的尼姑（当时称为“比丘尼”）。

二

净检，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人，后家迁洛阳，俗姓种，名令仪。她的父亲名叫种种诞，曾任武威（今甘肃民勤东北）太守。

种令仪自幼聪慧，才貌过人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。自幼读书习字，深谙音律，弹得一手好琴。她经常随父母出入官宦之家、豪门府第，人人都夸她是个才女。然而，谁又能料到，她竟然舍弃锦衣玉食，倒甘去佛门陪伴青灯黄卷。是阴差阳错还是一时鬼迷心窍？是婚姻破裂还是家遭不幸？看来都不是。据说有一天，她去洛阳宫城西门听法始和尚说法，竟怦然心动，萌发了出家的念头。她的父母知道后，开始是一番苦劝，但是说不动她。最后她竟对父母说，若是不依她的话，她就立刻自尽，了此一生。

父母也就只好由她了，还说这也许是她命中注定，与佛有缘。

但能冲破“家门”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进入“佛门”了。因为，当时还没有女尼出家的先例，也没有这方面的戒法。

当时道安、东晋名僧虽然制定有僧尼轨范，但尚未定型，而且大多只适用于和尚。所以，当种令仪去找法始和尚要求出家为尼时，法始即对她说：“西方虽然僧尼都有，但中国有僧无尼，佛法也不完备，我怎么好度化你呢？”

种令仪说：“比丘和比丘尼不都是一样的度法吗？”

法始说：“尼有五百戒，与比丘不同也。这样吧，我替你去问问智山法师……。”

智山法师是来自西域的高僧。他告诉法始：“比丘尼戒法与比丘虽然大同小异，但现在还没有比丘尼戒法传授。无法可依，看来她也就无法出家了。”

但是，有了比丘尼，不就有了比丘尼的戒法吗？这个“头”，总得有人开呀！她把这个意思对外来和尚讲了，又再三表明了自己笃志不移的出家志向和决心。这位外僧听了也觉得有理，便打开方便之门，说就暂时授以“沙弥尼”戒法吧。

所谓“沙弥尼”指的是7岁以上、20岁以下的小尼姑，一般限于十戒。这还没有取得正式为尼的资格，算是准尼姑吧。

管他百戒还是十戒，自从受了智山法师的戒法之后，种令仪就取了法名净检，首先来了个自我认可。她已把自己看成是正式出家的“比丘尼”了，而且还得到家里的支持，在洛阳城西门建立了一个寺庙，名曰“竹林寺”。

不久，竟然有24个少女来到竹林寺，拜她为师。净检不管自己是否有资格收徒弟，也不管佛门僧侣承认不承认她，反正她已建寺修行了，因此就收下她们一同修行。竹林寺从此成为中国的第一座尼姑庵。

不过，当时比丘住的寺庙和比丘尼住的庵堂，没有严格的界线，而且称谓也和印度不同。中国老百姓有自己的叫法，一般称比丘为和尚或师傅，称比丘尼为尼姑或师姑，年纪大、辈份高的，则叫“老尼”或“师太。”

净检和她的弟子们，在洛阳竹林寺修行出家的事，很快传扬开了，人们始而惊奇，继而也都重视起来。

东晋升平元年（357）二月八日，沙门僧建请外来高僧昙摩羯多来到洛阳依《僧祇尼羯磨经》及《戒本》正式建立戒坛为净检她们受具足戒。

当时，昙摩羯多浮舟于泗河结坛，净检等人于此坛从高僧受具足戒称为“船上受戒”（按关于净检受具足戒的时间有多种说法，此采其中一说）。

这样，她们才正式成为中国的第一批尼姑。中国尼众受戒，也就从此开始。

但是，据说汉代妇女阿潘早就受过戒法了，她才是中国最早的尼姑。净检只是晋时才出家的，算不得先行者。然而阿潘出家为尼，毕竟只是传说，净检出家受戒则有据可查（载《比丘尼传》），至于刘宋元嘉十一年（434）慧果、净音等人出家为尼虽然受的是全戒，但时间毕竟比净检要晚，因此，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尼姑，还是当数净检。

三

如果承认中国僧尼分别以朱士行和净检为起点，那么，尼姑的出现，则晚了大半个世纪，而且，从后来的发展势头和影响来看也不及和尚那么显赫。翻开《高僧传》、《比丘尼传》和《僧史略》一看和尚们那一边高僧辈出龙象迭现热闹之极尼姑们

这一边呢 却冷冷清清 名震环宇的“大尼”实属凤毛麟角。事实上，在佛国天地中，尼姑很难起到“半边天”的作用。这是因为，出家难，妇女出家则更难。据说“女人之心，弱而多放，佛达其征 防之宜密 是故立戒每倍于男也（竺法汰《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》）单是戒律 就比男的要多几百条。加上儒家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的帽子，更压得妇女们抬不起头来。别说出家修道，就是在家做人也难。

然而，时代却为净检提供了一个宽松、开放而自由的精神气候和人文环境。

诚如已故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的，魏晋六朝虽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、社会最苦痛的时代；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、极解放、最富于智慧、最浓于热情的时代”。宗先生从人格美和艺术美的角度，曾归纳出如下几点：

(1) “晋人在生活上、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，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。”也就是说，正由于社会秩序的大解体和旧礼教的总崩溃，才迎来了“思想和信仰的自由”。

(2) “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，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。山水虚灵化了，也情致化了。”这不仅表现为对自然宇宙和自己的深情 而且也表现为对人际关系中“友谊”的深情。因此 才使他们的胸襟“像一朵花似地展开，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，了解它的意义 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”即萌发出新的“生命情调”和“宇宙意识”。从而，使人格得到升华和伸展。

(3) “自然美和人格美——同时被晋人发现”了。这种美与美感是“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”的“最富于”简淡、玄远的意味”。晋人的道德观 正是“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、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，向自己的真性情、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、真道德”。

为此，他们不惜以自己的生命、地位和名誉来冒犯假借礼教以维持其权位的恶势力，而大胆追求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解放，由此表现出一种“不沾滞于物”、“事外有远致”、“志气宏放，傲然独得，任性不羁”的人格风采。宗先生称这样的人，真“伟丈夫也”（《美学散步》）。

在“谈玄说道”的时代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“才与貌”的结合和男女平等。

属于“才”的方面是“妙于谈玄”，属于“貌”的方面是“容貌整丽”。而且，男女平等，一视同仁。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和妇女把丈夫看成“天”的格言，在那个时代是行不通的。妇女的地位在当时是比较高的，争讼、造请、逢迎和为子求官、代夫诉曲之类的事，都是由妇女来承担。尤其是在北朝，因少数民族受儒教的熏陶毕竟要少一些，因此北方妇女更为自由一点。

这就是说，魏晋时代的妇女同样享有读书、社交、选偶等权力。南朝宋废帝刘子业之姊山阴公主对她的皇弟说：“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，俱托体先帝，陛下后宫数百，妾惟驸马一人，事不均平，一何至此！”她的皇弟立即便为她“立面首”30人左右。山阴公主也就毫不客气地全部收下。

“面首”产生于南朝宋孝武帝之时，固然是一种末流丑态，而山阴公主一次就要玩弄30个面首，也不啻是“淫泆之过”，但从另一个侧面看，这也说明当时的妇女要争取享有同男人一样的权力。如果说这个例子不足以说明问题，那么，当时才女辈出，女诗人满天飞的情况，则足以证明当时的妇女的确登上了人生舞台，而且扮演了她们应该扮演的角色。

在“谈玄说道”的时代，我们看到的另一个方面则是佛道结合，形神合一。

从道家来看，葛洪倡导的亦道亦俗，亦仙亦官的思想，以及